中华春秋

大汉雄風

□ 徐问笑

公元前202年12月，随着轰轰烈烈的楚汉争霸进入尾声，一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名战役——垓下之战，亦在“十面埋伏”的步步紧逼与“四面楚歌”的孤立无援中隆重上演。纵观中国历史，这无疑是一场衍生出最多历史典故的战役，而能够将小自己24岁，且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楚霸王项羽，逼至“霸王别姬”“乌江自刎”之英雄末路的境地，可想而知，“老朽”如刘邦者，也当是何等了不起的人物。经此一役，刘邦不但终结了楚汉相争之局面，也奠定了汉王朝四百年之基业。

群星闪耀

作为大一统王朝中历时最长的一个朝代，汉王朝自建立初始，便带有一种雄壮激昂之气。以至于日后，当名将陈汤发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响亮口号时，更是将那种“天下无人能与之匹敌”的冲天豪迈气概演绎得淋漓尽致，不但在那个时代有着振奋人心的效果，今人读之犹是热血沸腾、激荡不已。而开国皇帝刘邦能夺得天下，本就颇具传奇色彩，他不但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也是汉民族和汉文化的伟大开拓者之一。统一中国之后，正是有刘邦采用休养生息的宽松政策治理天下在前，又有“文景之治”在后，汉王朝才得以迎来了“汉武盛世”。

汉武帝刘彻向来是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一位皇帝，推崇他的人称其为“千古一帝”，不喜欢他的人则说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譬如司马光就毫不客气地说他有“亡秦之失”。然而，再苛刻的史学家，也无法否认他乃是一位有着大手段、大威力、大功绩的帝王。年少登基、雄才大略的他，不但在政治、文化上皆有建树，在军事方面也显示出超强的胆识与魄力。他“奋扬威怒，武义四加，所征者服”，不仅先后出兵平定了南越、闽越、夜郎、滇国、卫满朝鲜等国之乱，且远征大宛降服西域诸国。在对付汉王朝最大的外患匈奴方面，他更是展现出强硬的实力与手段，通过派名将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漠北，使中国“自开辟以来，惟汉家最为盛图”。

终西汉一朝，因遵守“非有功不侯”这条铁律，所以“马上封侯”便成为将士们的至高荣耀，此亦是激励将士奋勇杀敌、沙场建功的最公平方式。即便强横如汉武帝者，虽很想封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侯，亦不敢轻易破例，而是通过派他到沙场杀敌，希望借此达到封侯之目的。可惜沙场非游乐场，相较于同样是外戚身份且有“帝国双壁”之誉的卫青与霍去病这对舅甥，平庸的李广利连为他们牵马也不配。卫、霍二人军事天份之高、军事才能之卓越，即便勇武过人、曾让文帝感叹“生若逢时，当封万户侯”的飞将军李广，在他们面前，也变得黯淡无光。卫青首次出征时，与李广等四位将军各领一路人马，分头出击，然在另三路人马中两路失败、一路无功之情况下，惟卫青却是奇袭龙城成功，此亦是自汉初以来对战匈奴的首次胜利，故军事意义极为深远。此后，卫青这位“名不虚传”的军神，更是六战六捷，创造了其一生对战匈奴无一败绩之奇迹，为北部疆域的开拓立下了赫赫军功。

霍去病初次征战时，即率领800骁骑深入敌境数百里，将匈奴兵杀得四散逃窜。在两次河西之战中，霍去病大破匈奴，直取祁连山，更俘获了匈奴至尊圣物“祭天金人”，甚是大快人心。在漠北之战中，勇猛果敢的霍去病，犹不负其天才将军之称，不但率军深入追击匈奴，将其一直打到瀚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方才大捷而归，而且开创了“封狼居胥”的壮举，此一举后来成为中华民族历代兵家人生的最高追求和终生为之奋斗的远大理想。

更为可贵的是，以区区21岁之龄，便立下“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之不世军功的霍去病，面对帝王隆宠，他不但未曾志得意满，反而依然战意昂扬、壮志犹存。被封冠军侯后，他竟以“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之语拒绝了汉武帝所赐豪宅，这句千载已过犹是熠熠生辉的名言，不但体现了他不杀尽敌人誓不罢休的决心，也表明了他舍家卫国的耿耿忠心，因此，虽是短短八字，却有着震撼千古之力量。不得不说，此乃大汉尚武精神的最高体现，以一世之人的牺牲与奉献，换来国家稳定繁荣与边疆长治久安。

有“在汉中兴，充国作武”之赞誉的名将赵充国，其一生历经武帝、昭帝与宣帝三朝，74岁高龄时，仍自荐领军出战。今人常用的成语“百闻不如一见”，最早即是出于他之口。他所倡导的留兵屯田之策，可谓深谋远虑，不仅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且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所以杜牧说他“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

到了汉元帝期间，名将陈汤奇兵斩杀郅支单于之首，不但一雪累年之耻，且使“万夷慑伏，莫不惧震”，至此，大汉之威已然达到了最高点。陈汤给汉元帝的上书中，其显示出的“威风凛凛、所向披靡”之强大气势，犹令后世之人仰服不已，故知大汉雄风，即如此也。

忍辱见志

然一个王朝之强大，必然是内外兼修的。故大汉之雄，不仅体现于其军事实力之强大，也体现在其文化成就与内在精神气质方面。中国文学史上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句，足可见秦汉文学之崇高地位，然秦王朝历时短促，故文学成就主要归功于两汉期间。两汉文化思想兴盛，跟汉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是分不开的。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在这种情况下，旷世巨著《史记》才得以应运而生，否则，凭司马迁一人之力，根本无法独立完成“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撰写工作。

史书记载的“苏武牧羊”之历史典故，讲的是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整整十九年之久而始终不曾变节的事迹。除他之外，出使西域的张骞，亦曾被匈奴扣押长达十年时间。匈奴对他们威逼利诱不成后，便百般折磨，其间经历之艰辛，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但苏、张二人始终都体现了“不辱君命”“持节不屈”的坚贞品质，前者更成为历代“忠臣”之代表人物，这也是一种大汉精神意志之所在。

历史上赫赫有名、及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丝绸之路”，初期虽是出于战略外交目的，张骞才在汉武帝安排下出使西域，然此举实实在在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历史突破。且因张骞得封博望侯，一些有识之士亦效之，才有了东汉时班超的“投笔从戎”“平定西域”之壮举及“万里封侯”之功勋。

一个产生伟大帝王的时代，必然伴随着许多传奇人物的涌现，而能够知人善用，才是建立不世功业之根本。因能知人善任、重用如“汉初三杰”者，故刘邦能成为天下之主；因能大胆提拔人才，故刘彻得以成就其“汉武大帝”之千古威名；因得“麒麟阁十一功臣”之尽心辅佐，故有昭宣中兴之盛世出现；因有“云台二十八将”之追随与拥戴，故刘秀得以开辟了“光武中兴”之东汉时代。可以说，大汉王朝既是一个天才人物迭出之朝代，也是一个无数英雄人物湮没其中不被人熟知之朝代，盖因群星璀璨中，惟其最耀眼、最显赫方能不被遮掩光芒。

后世多有学者认为，相较于游牧民族之勇猛与彪悍，中原民族战斗力极弱。事实上，中华历来民族众多，何独大汉能够攘夷拓土、国威远扬？概因其时之人，骨子里自有一股昂扬不屈之志气。汉人讲究“义不受辱”，对内，体现在对人格尊严之捍卫，终汉一朝，自杀的大臣达百余人，如绝食而死的周亚夫、引刀自刭的李广、饮鸩自杀的萧望之，皆是不愿受辱。对外，则表现在对国家尊严与民族气节之坚守，自汉高祖“白登之围”后，汉王朝以忍辱修好之方式，争取了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机会，为汉武帝一朝崛起，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在这六十年中，出于“谋定而后动”之战略考虑，暂时委曲求全，但对外敌之屈服，仍是一件奇耻大辱，让大汉王朝上下充满着不甘情绪，所以汉武帝耻极而挟怒出击，才能一举而成功。不但如此，其后为永绝后患，强悍的汉武帝更是连连主动出击，将进攻即是最好的防御这一兵法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诚不负其“强汉”之历史评价也，纵观史书，不曾有哪一个王朝，像大汉王朝般自始至终皆激荡着一股慨然之气。即使落幕时，也依然不曾意气消沉，而是如一首荡气回肠的战曲，让人热血沸腾。三国时代之金戈铁马、群雄争霸，一个个英雄人物横空出世，演绎出一页页气势磅礴的篇章，然他们不论出自于曹魏、东吴还是蜀汉，皆是大汉子孙，展现的亦是大汉之武力与意志。故所谓大汉之绝世气势，即是兴也辉煌、亡也壮烈也。



中外清史学家的历史性握手

——记戴逸与欧立德的会面

□ 郝倖仔

2016年10月24日下午，正逢节气霜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主任办公室里，却荡漾着春天一般的暖意。一位器宇轩昂的美国学者与一位须发皆白的中国长者的手紧紧相握。年轻的美国学者说：“90岁不算大，要活过100岁嘛。”长者则开怀大笑：“我努力！我争取！”场面的热烈驱散了晚秋萧瑟的寒气。

这位美国学者就是哈佛大学副教务长、美国清史研究领军人物欧立德教授。长者则是闻名于世的中国清史工程的执牛耳者、“国宝”级史学大师戴逸先生。用北京大学历史系罗新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清史的头一把和美国清史的头一把会师了，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意义重大。”这一会面无疑是中国官修史书与国际史学界的一次高端对接，促进了不同文化、不同历史阐释方式之间的交汇融通，是中国清史工程从辉煌走向更加辉煌的关键一步。有幸作为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唯一见证者，笔者忠实记录下两位巨人相遇相惜的全过程，谨以飨读者，以存史证。

就座甫定，戴逸先生就谈起了他念兹在兹的清史工程。他特意介绍说，清史工程如今已进入了最后阶段，正在进行第三次审查，预计2018年上交初稿，主体部分100册，有二十四史加在一起这么多。欧立德教授笑言，如果乾隆皇帝知道大清朝的历史能写100册，能有这样的规模，一定会非常高兴。

戴先生称赞欧立德教授的中国话说得好，闭起眼睛听，就像中国人一样。教授很开心，坦言自己也花了很长时间学习汉语。他回忆说自己开始学中文是1979年，正好是中美建交那一年，那时候美国学中文的人很少，现在则完全不一样了，美国人学中文的很多，哈佛的学生选修外语最多的是西班牙语，第二位是法语，第三位就是汉语。不光是大学，在中学乃至小学，小朋友们在学中文。这个趋势近二十年以来越来越明显。他有些得意地透露，好几次在中国打电话订餐，等到当面取餐时，服务生都很惊讶：“您居然是个老外？”

1979年，对当代中国来说，无疑是惊蛰的一年。一切都即将开始，一切又还不明朗。作为中美关系破冰后第一批自发学习汉语的美国人，他们的选择不仅仅出于对中国的友好和感情，更是出于对中国前途的关心和信心，甚至还带着几分宿命的认定。

这一生，教授选择了中国，先生则选择了清史。

戴逸先生对于国际史学界的新思想、新观点始终非常关注，他的学术胸怀总是如此的宽广。戴先生对欧立德教授说：“你们‘新清史’研究的问题对我们很有帮助，很有启发。您的文章我也读过一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的关系。你们花的力气很大。”欧立德教授说：“您太客气了，我做的还很不够。现在中国国内也非常强调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重要性。人民大学清史所已经设立了一个满文文献研究中心。我有个学生在密歇根大学办了一个满学会，还和中心有互动。我的学生到北京来学习，该中心也都给予支持和帮助，这样的来往和学术交流的网络，对新一代的学生们非常有利。”戴先生追问：“美国有多少人在学满文？”教授说：“我就在哈佛教满文，每年都有学生在学，虽然人不多，但是慢慢积累起来也有不少。”先生表示：“相对于数量巨大的满文文献来说，中国学习满文的也不算多，大家在这方面的努力都很有意义。”先生曾在多个场合谈到掌握少数民族语言对清史编修的重要性：“满汉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不是单方面的。汉族同样也吸收了满族的文化，诸如对满族的语言、服饰等等，都有专门的研究。‘档案’二字，即出于满族语汇中的‘档子’。所谓‘京派’‘京味’，其实都保存了大量的满族文化。”

从语言学入手把握文献是从王国维、陈寅恪一脉下来的中国传统史学最正宗的路子，也是国际历史学研究的核心方法论。戴逸先生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兼容并包，增进了不同文化、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鉴，进而为后辈学人创造出了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学术环境。先生一生桃李满园，他的学术格局与胸怀就是一面旗帜，标志着中国清史工程的高度，影响着中国清史学界的后劲。戴逸先生就是大江大河，他用生命的巨浪把年轻一代推向浩瀚的海洋。

说到清史编修的难度之大，戴逸先生感叹，清朝的历史和以往各个朝代的历史都不一样，出现了很多新事物。另外，档案文献层出不穷，数量之大不可想象。即便是清史这一门专业，一个人投入毕生精力，也只能接触一个角落——欧立德教授感同身受：“还只是很小一个角落。”——我们搞这个大清史工程，要把整个清代历史的汪洋大海都描绘出来，实在是困难啊。此外，史书的编写自有时代的局限，过若干年再回过头来看，就又不行了，这是必然的。欧立德教授对戴先生的忧心倒是看得很开，他宽慰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其实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古代罗马也是如此。这恐怕是老故事了。我们还是要有所期待！”两人相视而笑，先生的笑容里更是多了一份难得的释然。对修史事业的敬畏使他习惯了对所有的细节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所有他力所不能及的遗憾都如梗在胸，意欲以一己之力强而为之。他就这样在执拗和较真中度过了寻常老人得以安享晚年的15个春秋。

欧立德教授非常肯定清史工程在文献整理和翻译方面的贡献，说这些研究成果他们都买了，这都是戴先生的功劳。说到这里，两双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戴先生眼中波光一闪，欣慰地笑了，他的付出、他的执着、他所有的努力，有人看到了。服务清史工程6年，作为一名青年学者静察旁观，笔者无数次地感受过先生的坚持。每次先生来开会，那颤颤巍巍却坚定如一的脚步；每次去看望先生，那伏在窗前的书桌上看稿子的侧影，这些定格的画面叠加着眼前这双久久相握的手。先生，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离开时，我们执意不让先生送出房间，怕霜降的寒气侵了他。先生只好扶着门框不无欣慰地目送我们，欧立德教授频频回顾，不住地招手。走廊很长，先生的身影渐渐远去，渐渐模糊。欧立德教授默默地走着，突然说：“这是一位可爱的老人，”顿了一顿，又说，“非常可爱。”之后，又是久久的沉默……

环球史话

（上接1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中，一方面突出强调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和政治灵魂，另一方面又突出强调要“扎紧制度的笼子”。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强调两者的紧密结合和有机统一、形成合力。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思想，在《准则》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准则》头两条“坚定理想信念”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鲜明体现了把思想政治建设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首要任务的思想。“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等内容，则鲜明体现了立规明矩、完善制度、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制度治党思想。同时，《准则》还坚持了两者的紧密结合和有机配合，即在思想政治建设中注重建章立制、在制度建设中注重通过思想教育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比如，在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时，除了强调思想教育外，还明确指出：对不坚定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政治不合格的干部“坚决不用，已在领导岗位的要坚决调整，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使得思想上的软约束变为制度上的硬约束。再比如，在强调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时，还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自觉检查和及时纠正在行使权力、廉政勤政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好体现了制度他律与思想自律的有机结合。这些都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思想的重要体现。

坚持激浊和扬清两手抓

2016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坚持激浊和扬清两手抓，让党内正能量充沛，让歪风邪气无所遁形”。这一重要思想在《准则》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所谓激浊，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这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务。《准则》强调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决反对“四风”，特别是要防范和查处各种隐性、变异的“四风”问题，坚持抓常、抓细、抓长，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常态化、长效化；强调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和队伍纯洁等等。这些都是“激浊”的重要表现。

所谓扬清，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这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证。《准则》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强调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党的各级组织要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强调任何人都不准把党的干部当作私有财产，党内不准搞人身依附关系，规范和纯洁党内同志交往等等。这些都是“扬清”的重要表现。

坚持重点与全面相结合

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即管全党、治全党；同时又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形成示范。坚持重点与全面相结合，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一大特点，也是《准则》的一个鲜明特点。

《准则》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纲领性文献，其中提出的各项要求，无疑是面向全党，面向全体党员的。《准则》强调：“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党的共同任务，必须全党一起动手。”

同时，《准则》又强调要以高级干部为重点，特别是要抓好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人员这个关键。《准则》指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从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做起。高级干部要清醒认识自己岗位对党和国家的特殊重要性，职位越高越要自觉按照党提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越要做到党性坚强、党纪严明，做到对党始终忠诚、永不叛党。”《准则》还提出要制定高级干部贯彻落实本准则的实施意见，指导和督促高级干部在遵守和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上作全党表率。

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

1980年版《准则》既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又对党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进行了归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丰富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主要原则和规定今天依然适用。《准则》也在很多方面继承了1980年版《准则》的主要精神和内容。比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目标和基本准则，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关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关于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关于保障党员权利不受侵犯，关于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等等。

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一方面要传承和发扬党内政治生活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要立足新的实际，不断进行改进和创新，善于以新的经验指导新的实践，更好发挥党内政治生活功能作用，使各种方式的党内生活都有实质性内容，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除了强调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之外，还特别强调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时代性”的重要内涵。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在重申1980年版《准则》的主要原则和规定的同时，《准则》又结合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规定，体现了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比如，《准则》突出强调树立“四个意识”，就是针对目前党内政治生活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突出强调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也是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管党治党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实际问题提出来的。再比如，《准则》强调坚决纠正唯票、唯分、唯生产总值、唯年龄等取人偏向，强调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强调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健全不当用权问责机制，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等等，这些具体规定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都是针对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来的，也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新实践、新经验的总结。

《准则》为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基本遵循。我们要全面深入贯彻《准则》，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确保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胜利。